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

蔡乐苏 张 勇 王宪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一部专著。作者从维新思想的源流、维新方案的多极导向、多种政治势力的分合、消长、变法高潮中的复杂变化等多个角度,深入研讨了戊戌变法的历史进程,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更新了对戊戌变法的整体认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蔡乐苏,张勇,王宪明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4

ISBN 7-302-04315-9

. 戊... . 蔡... 张... 王... . 戊戌变法-研究
. K256 .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450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 www . tup . tsinghua . edu . cn](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 32 印张:29 字数: 72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4315-9 K · 10

印 数: 0001 ~ 2000

定 价: 59 .00 元

第一章 思想之源

发生于 19 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从理论上是对 18 世纪末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成果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解 18 世纪末以来与变法思想有关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认识维新变法运动。

第一节 老大帝国面临新问题

一时代有一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1644 年,当新兴的爱新觉罗王朝入关时,它代表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权,八旗劲旅所向披靡,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康熙皇帝继位后以极大的努力先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又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企图,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国平定后,康熙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其后继者雍正皇帝又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人丁税,使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一百多年,到 18 世纪中叶,即从顺治皇帝,中经康熙、雍正皇帝,到乾隆皇帝年间,经济日趋繁荣,社会日趋稳定,国家的收入和储备不断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受人瞩目的强大而文明的国家。

应该说,清朝前期在解决国家统一和恢复发展经济方面确实有突出的表现。但对于强盛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清朝统治者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这些“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一是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二是外部世界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压力。这两大问题成为 18 世纪末以来关系中华民族命

运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人口问题。从有正式人口统计的两汉开始,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人口一直在 2000 万至 6000 万之间徘徊,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全国人口达 59 594 978,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锐降至 21 007 820,桓帝永寿三年(公元 157 年)复升至 56 486 856,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等原因,人口曾有过大幅度下降,到隋、唐、宋时,始恢复到汉代的水平,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始超过汉代人口统计,总人口数达到了 59 848 964,明代中期人口进一步有所增长,达到了 63 654 248 (1562 年)。据人口史专家研究,上述人口数字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实际的人口数字要少得多,但大体尚可反映历代人口的变动趋势。清代初期,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统计数字曾一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由于“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赋税政策的实施,使这种趋势很快就得以改变,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据《清鉴》记载,康熙末年人口 2538 万,乾隆末年人口达 29 700 余万,“人口增殖,较之康熙末年,殆多至十倍以上”。实际的数字虽未必如此悬殊,如孙毓棠先生等估计清初人口(1661 年)达 95 688 260,1721 年(康熙六十年)达 123 612 120,但增长的幅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乾隆以后,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仍然不减。嘉庆八年(1803 年)全国人口总数突破了 3 亿,31 年后,即道光十四年(1834 年),全国人口已突破 4 亿,达到 412 814 828。

人口的大幅增长一方面说明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适合了时代

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1,4~1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印鸾章:《清鉴》下册,490 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

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垦田与丁口的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

的需要,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的繁荣稳定,为人民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但另一方面却又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国外高产农作物新品种如美洲玉米、红薯等的引进和大规模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压力,但清朝统治者对此仍十分烦恼。乾隆皇帝常常感叹:“民愈庶,富愈难”,“国家承平,百有余年,人生不见兵革。每岁户口孳息,千古罕俦。民间谷价,有增而无减,实由于此。朕焦劳宵旰,每怀尧、舜犹病之忧”。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作《民数谷数》诗,诗中说:

民数谷数国之本,每岁各省令具奏。
因命司农计损益,观之持盈惧益懋。
谷数较于初践阡,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
淳朴拟欲禁奢费,游手谋食恐难付。
设曰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
水旱赈济数逾万,无过补置其罅漏。
三免正供两免曹,未见闾阎生计茂。
长此安穷不敢言,蒿目怵心呼天佑。
绥丰或尚可支持,惕息中丰又难遘。

关于美洲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参见全汉升:《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701~702页,台湾,稻乡出版社,1991年1月。

《清实录》卷五九九(乾隆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戊戌条,第16册,6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此处乾隆皇帝自注:昨岁大理寺少卿刘天成奏请风俗崇俭还淳一折,余心是其言,而行之实有所难。盖太平日久,由俭入奢,不期而然,骤加禁令,罹法者多,且游手谋食之人,转失生计,非善策也。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

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

人口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仅消解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大多数人生活于贫困状态之中,而朝廷遵循传统的轻徭薄赋的信条和信守自己所颁布的“永不加赋”的诺言,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增加,不仅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而且连政府官员的薪水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致使收受贿赂成为官员补贴生活的主要手段之一,低级官员要得到升迁,就拼命通过行贿等手段巴结、讨好上司,而一旦得到任命后,又加倍从下属和民间搜刮,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在同期也遇到了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增加了生产数量,缓解了人口压力,同时,欧洲各国采取措施,大规模向国外,特别是美洲等地区移民。据统计,19世纪20年代,有14.5万人离开欧洲,而到19世纪50年代,约有260万人移居国外,1900—1910年间,欧洲向外移民多达900万。据统计,1846—1932年间,欧洲共向美洲、亚洲等地移民6366万人。大量的移民占领或分布到了相当于几个欧洲的土地上,使得欧洲本土的人口压力得到消解。

清王朝建立以后所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世界的一体化及其所带来的机遇和问题。继15世纪末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16世纪初葡萄牙水手麦哲伦成功地到达亚洲并完成环球航行之后,17—18世纪,欧洲国家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相继加入了扩张的行列之中,陆续占领或控制了非洲、美洲、亚洲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愚昧落后中摆脱出来,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扩张活动对整个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人们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

参见 A .M .卡尔 - 桑德斯:《世界人口》,49、56 页,牛津出版社,1936; W .S 和 E .S .沃伊廷斯基:《世界人口和生产》,69、93 页,纽约,1953。

识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大陆,尽管内陆地区腹地的情况还不太明了,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已经为人们所了解;全球性的经济贸易关系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第一次国际分工完成,南、北美洲和东欧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的经济活动。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股悄然崛起的势力一开始目标就盯着中国。哥伦布首次出航时,西班牙国王给他的使命就是寻找到达中国的路径并与中国建立联系,他之所以把在美洲发现的土著居民称作“印第安人”,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到达了中国的印度。此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派出的探险队亦多以中国为目标。西欧主要国家的船只均已抵达中国,与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贸易,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还分别于1557年、1626年和1641年先后占领了台湾和澳门,英国的舰队也在广东等地沿海与中国守军发生过冲突。

1644年清朝建立后,武力强盛,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般说来,国家比较强盛之时,统治者趋向于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朝入关之初,由于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南明政府在东南沿海一带坚持抗清斗争,西方势力又频频在沿海地区出没,迫使清政府采取海禁政策。而在1683年收复台湾、国家内部统一基本完成以后,清廷采取了一定的开放措施,下令允许商民造船出海,进行国际贸易,开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海关,办理对外贸易并监督外商,同时加强对留驻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管理,逐渐恢复或新建立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丹麦、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秘鲁、墨西哥、智利、汉堡、不来梅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海上贸易。陆上则大大恢复和扩展了明代收缩的贸易,与中亚的哈萨克、浩罕、布鲁特、布哈拉等汗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并一度试图打通经由中亚到达欧洲的陆路贸

易通道,但由于英、俄等国在中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而未能成功。

清政府在允许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的时候,其着眼点主要不在贸易活动本身。换言之,清朝统治者并不认为国家间的贸易活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多大的积极意义,之所以要允许这种贸易,是因为它可以向四方“夷狄”小国宣示国威。乾隆皇帝于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托马嘎尔尼转给英国女王的信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上述思想: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贡赍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觐,赐之筵宴,赉予骍蕃,业已颁给敕谕,赐尔国王文琦珍玩,用示怀柔。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稟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恐尔使臣等回国后,稟达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据尔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

货物发卖,……更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然,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益。若于京城设行发货,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挽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

乾隆皇帝信中所表现出的天朝大国不可一世的傲气说明清朝统治者对正在迅速发展的近代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毫无感受,而只是把这种近代世界的重要活动当成天朝上国对“夷狄”小邦的恩赐。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想法,而是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想法。有的高级官员提出,“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建议对不听约束的外国商人严加

转引自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历史事实》,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35~2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分册,82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72。

控制,否则就“闭关不纳”,断绝其贸易。

古老的大国在迅速一体化的世界面前遇到了新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点,统治阶级中的所有阶层、所有派系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变法维新活动也首先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

第二节 学派与政治:常州学派和湖湘学派的动向

清中期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促使士大夫阶层去进行严肃的思考,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北学派(直隶)、桐城学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岭南学派等均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常州学派和湖湘学派崛起尤为神速,对现实的反思亦较其他各家更为深刻,所得成果对晚清政治影响尤大,下面即主要对常州和湖湘两学派的发展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常州学派:常州古名延陵,秦置县,西晋以后,历代设郡、州、路、府治,城名先后更迭为毗陵、毗坛、晋陵、兰陵、常州等。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常州府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匱、宜兴、荆溪、江阴、靖江等县。乾隆后期,常州籍官员庄存与研读、授徒、著书立说,自成一派,史称常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除创始人庄存与之外,还有庄述祖、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等。

庄存与(1719—1788),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1745年)中一甲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3年以后,从翰林院散馆时,因书法不佳,考列二等之末,被停编修之职。又3年以后,再授编修之职。此后,他先后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及湖北、直隶、山东、河南学政等职。充天文算法总裁及乐部大

臣,值上书房、南书房近40年。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庄存与主持满洲、蒙古童生考试,因要求严格,应试童生无法作弊而大闹考场,经御史汤世昌参劾,庄被革职,乾隆皇帝随即亲自主持复试,查出考试夹带、信鸽传递等多种作弊情形,且作弊者正是带头哄闹考场之人,遂撤消对庄存与的处分,庄得以官复原职。

庄存与出仕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时期,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的矛盾相继出现或加剧。18世纪70年代中,和糴从侍卫迅速提升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各种矛盾更趋激化,庄存与本人“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不仅庄存与本人政见与和糴不合,其侄子庄述祖和女婿刘召杨也受到影响,先后于80年代初退出官场,转向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春秋》据传为春秋末年孔丘所删定,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三传中,《左传》成书较早,使用的是“古文”,注重以史实解经,《公羊》与《谷梁》成书较晚,使用的是“今文”,重在阐发《春秋》中所蕴藏的微言大义,《公羊传》尤其如此。由于阐发微言大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因此,《公羊传》常常被政治家用作借以发表自己的现实政治主张的载体。西汉时,传《公羊传》的公孙弘受汉武帝赏识,以儒生而登相位;著《春秋繁露》的董仲舒则被推崇为群儒之首,其著作亦成为汉武帝时期重大政治决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汉以后,《公羊传》逐渐被冷落,以古文记载

《清史列传》,第6册,1797~17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参见[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74~7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关于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原因,详见刘桂生:《清初公羊学复兴原因探究》,载《庆祝周一良先生八十诞辰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的《左传》则受到了重视。

庄存与转向《春秋公羊传》研究,撰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等书,遵循公羊学的传统,借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之机,发表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主张。他不仅借传统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公羊学理论术语阐释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借古代经学家何休、董仲舒诸人之口,发表自己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对策。对于朝廷政治上的混乱,庄存与借阐释《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条时说:

何休曰: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纪,故先言元,而后言春。……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而对于权贵专权、贤者不得用的局面,庄存与借公羊子之口说:

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哀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庄存与:《春秋正辞·建五始》。

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

庄存与的侄子庄述祖(1750—1816)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进士，并先后在山东昌乐、潍县等地任知县，后辞官回乡，著书立说，撰《夏小正经传考释》、《古文甲乙篇》、《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考证》等十数种。庄述祖本人以音韵见长。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他以小学而力证《公羊传》优于其他各传：

《春秋》之义，以《三传》而明，而《三传》之中，又以《公羊》家法为可说。其所以可得而说者，实以董大中综其大义，胡毋生析其条例，后进遵守，不失家法，至何邵公作《解诂》，悉隐括就绳墨，而后《春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得其正。凡学《春秋》者，莫不知《公羊》家诚非《谷梁》所能及，况《左氏》本不传《春秋》者哉！假设无诸儒之句剖字析，冥心孤诣，以求圣人笔削之旨，则缘隙奋笔者皆纷纷籍籍，以为《左氏》可兴，《公羊》可夺矣。

又提出刘歆窜改《左传》说：

《左氏春秋》经刘歆私改者，如“壹戎殷”，改“壹”为“殪”。经杜预误写者，如“不”读为“不夕食”，此皆不明古义。刘之逞臆虚造，杜之袭陋传讹，其失一也，……

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1814年中进士，官至礼部

庄存与：《春秋正辞·天子辞》。

见《庄述祖传》，《清史列传》卷六十八，第17册，5542～55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庄述祖：《夏小正经传考释·自序三》。

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

主事。幼时曾见过外祖父,后从舅舅庄述祖问学,尽得外家之传并将其发扬光大。刘逢禄在谈到公羊学的核心问题“大一统”时指出:

自王纲不振,《小雅》尽废,强大兼并,君臣放弑,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极于中国微灭,吴楚狎主,而三代之彝伦法制斲坏简弃无复存者。盖夏、商之末失以强,而周之末失以弱。……厉幽之亡,不生孔子,天将以《春秋》之制统三正而正万世也。……(夫子)受命制作,取百二十国之宝书,断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上诛平王而下及于庶人,内诛鲁公而外及于吴楚,虽冒万世之罪而不敢避,……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天子之不可正,则托王于鲁以正之。

托王改制变法,就要有一个新王。刘逢禄说:

“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鲁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圣人在位如日月之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蒸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春秋是也,故日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

春秋之世的特点是四夷猾夏而狎主中国,新王在处理大一统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诛绝例第九》。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

与四夷的关系时,不应鼓吹尊王攘夷,而应肯定“四夷狎盟”。他分析说:

余览《春秋》进黜吴楚之末,未尝不叹圣人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圣人序东周之《书》,唯存《父侯之命》及《秦誓》,著其盛衰大旨。其于删《诗》,则列秦于《风》。序《蒹葭》曰:“未能用周礼”。序《终南》曰:“能取周地”。然则代周而改周法者,断自秦始,何其辞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国辟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然其地为周之旧,有文武贞信之教,无敖僻骄侈之志,亦无淫佚昏惰之风,故于《诗》为夏声,其在《春秋》无僭王猾夏之行,亦无君臣篡弑之祸,故《春秋》以小国治之,内之也。吴通上国最后,而其强也最骤,故亡也忽焉。秦强于内治,败穀之后不勤远略,故兴也勃焉。楚之长驾远馭强于秦,而其内治亦强于吴,故秦灭国而终覆秦者楚也。圣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运而反之于礼义,所以财成辅相天地之道而不过乎物,故于楚庄、秦穆之贤而予之,卒以为中国无桓、文,则久归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后京师楚哉。于吴光之败陈许,几以中国听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国亦新夷狄也。……故观于《诗》、《书》,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坏,虽圣人不可复也。观于《春秋》,知天之以秦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

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进一步发挥了其师的思想学说。龚自珍(1792—1841),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杭州)人,祖父龚敬身做过道员,父亲龚丽正做过署理按察使,11岁时随父进京,27岁中举,29岁任内阁中书,官至礼部主事,1839年辞官南归,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学。龚自珍本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治古文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

学,后在京结识刘逢禄,遂尽弃所学,从刘氏治公羊学。但与刘逢禄不同的是,龚自珍不仅采取委婉曲折的隐喻方式借阐释经典来发表政治见解,而且更直接地发表对于现实政治问题的主张。无论在转向公羊学之前还是在转向公羊学之后,他都对现实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影响现实政治。他认为,学(学术)与治(政治)是合一的。他指出: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

对于长期以来学者颇有争议的“尊德性”与“道问学”,龚自珍认为,两者之间是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祈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余则规世运为法。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自乾隆初元来,儒术而不道问学,所服习非问学,所讨论非问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里,有诂训实事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始卒具举,圣者之事也,余则问学以为之阶。夫性道可以骤闻欤?抑可以空枵悬揣而谓之为有闻欤?欲闻性道,自文章始。……

与此相关,龚自珍认为,汉学与宋学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一定要分出汉学与宋学的界限,则未免令人多有不安。他指出: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短订,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异,而附于经,谬以裨竈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

学术上这种治学合一、尊道性与道问学并重、汉宋无别的理念,使龚自珍更加关注现实。他结合历史从学理上论述变法的必要性,指出:

龚自珍:《江子屏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193~194页。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346~347页。